

Jîn-lūi-hák Sī-ia̍ ê Oát-lâm Bûn-hòa

人類學視野下的越南文化
Vietnames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越南 梁文希·黃玉秋·吳氏芳蘭等／著
蔣為文 教授／審訂

VĂN HÓA VIỆT NAM
DƯỚI GÓC NHÌN CỦA NHÂN HỌC



TRUNG TÂM NGHIÊN CỨU VIỆT NAM
國立成功大學 越南研究中心
NCKU Center for Vietnamese Studies



社團法人台越文化協會
Hiệp Hội Văn Hóa Việt Đài
Association for Taiwanese and Vietnamese Cultural Exchange

TAEF
Taiwan Asia Exchange Foundation
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



Tài-gi Kì-kim-hồ
蔣發太孫玉枝台語文教育基金會
Taiwanese Foundation



工作坊與會學者合影



VĂN HÓA VIỆT NAM
DƯỚI GÓC NHÌN CỦA NHÂN HỌC

目錄

蕭新煌序言：新南向政策要有文化與學術的視野.....	10
蔣為文序言：越南文化的多樣性與豐富性.....	12
第一章：人類學視野下的越南南部文化.....	15
第二章：越南語裡具方言特性的情態詞表現方式.....	41
第三章：越南南部越、華族群文化交流下的語言接觸現象.....	69
第四章：越南南部之文化生活中的本土宗教.....	83
第五章：南部佛教的主要特點.....	107
第六章：越南天主教與地方文化融合的「本土化」過程.....	125
第七章：越南基督新教的價值和發展過程的初探.....	143
第八章：低地越南的社會文化生活以及社會關係.....	171
第九章：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的小農經濟.....	215
第十章：從經濟人類學的視野分析越南北部紅河流域 大規模土地所有權的衰落.....	245
第十一章：義安西部與北部山區少數民族地區 市場經濟發展中的文化資本.....	265
第十二章：越南北方山區的跨國界族群關係.....	289
第十三章：越南與寮國跨國界族群關係：以河靜省山金一鄉社 以及昆嵩省博伊鄉社為研究案例.....	327
第十四章：越南西南部之族群關係.....	349
第十五章：與亞洲他國民族互動關係下 看越南的占族人和占族文化.....	379

第十二章

越南北方山區跨國界族群關係

QUAN HỆ TỘC NGƯỜI XUYÊN BIÊN GIỚI

Ở KHU VỰC MIỀN NÚI PHÍA BẮC

王春情 (Vuong Xuân Tinh)¹ 著

呂越雄² 譯

跨越邊境的族群關係 (Cross-border ethnic relations) 是指在某一國家與其鄰國共用邊界的族群之間的關係，包括該國境內的同族和異族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在歷史上由來已久，自國家建立以來就一直存在。在多民族國家中，這種關係一直是政府和民眾都非常關注的問題，因為它與國家安全、主權和發展密切相關。對於民族學和人類學而言，研究跨越邊境的族群關係有助於瞭解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歷史、文化和民族發展過程 (Ethnic processes)。在越南北部山區，研究跨越邊境的族群關係就是要瞭解這些族群在越南、中國和寮國之間與同族和異族之間的關係。

在越南，跨越邊境的族群關係已經被歷史學、民族學和文化學一些研究提到了，但仍然是零散的，直到 21 世紀，學者們，特別是新的民族學和人類學領域開始深入關注，這促進了該領域研究的發展。這種發展基於現實的基礎，即在越南現代史上，越南地區和國際關係從未像今天這樣開放。本文結合了文獻研究和筆者在 2008 年至 2022 年期間實地研究的結果，介紹現今越南北部山區跨越邊境的族群關係

¹ 博士，越南民族學人類學協會副教授。

²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

的情況。在闡述這種關係時，筆者主要關注各國邊界兩側地區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並未涉及京族與漢族之間、京族與寮國族之間的關係，事實上，這些關係也很少受到越南和國際學者的關注（Endres，2015）。另一方面，跨越邊境的族群關係在許多領域發生，但筆者只關注一些特定的領域。本文的主要內容如下：1. 綜觀跨越邊境族群關係的研究觀點；2. 越南北部山區的各族群在東南亞大陸地區和中國南部歷史民族學中的角色；3. 國家邊界歷史和當代各國政策對跨越邊境的族群關係之影響；4. 跨國界貿易；5. 跨國界勞動移工；6. 跨國界婚姻；7. 跨國界犯罪。

1. 綜觀跨越邊境族群關係的研究觀點

1.1. 研究綜觀

越南北部山區的跨國界族群關係曾被封建時期的歷史學家提及，但主要是越南與中國邊境地區的族群關係。在這種關係中，歷史學家通常關注邊境地區的治安問題。例如，《大越史記全書》（卷一，2011：269-278）記載了關於儂智高（Nùng Trí Cao）的事件，他是屬於儂族的人，在1041-1053年間在今日屬於高平省的邊境地區建立了自己的國家，招募了來自邊境兩側的各族軍隊，來對抗越南的李朝和中國的宋朝。現今學者們仍然關注儂智高這個人物（安德森 Anderson，2007：495-512）。

1945年以後，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就是現在的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越南的一些民族學和歷史學研究提到了許多北部山區的少數民族從中國遷徙到越南的問題。在1978年越南民族學研究所出版的《越南少數民族（北部省份）》一書中，許多少數民族被確定為從中國移民到越南。有些移民浪潮已有數千年的歷史，如泰族；有些則只有約一百年的歷史，如苗族。有些族群如瑤族和苗族的遷徙路線不

僅從中國到越南，還有一部分人繼續移民到寮國，或者從寮國移民回越南。在《越南北部邊境少數民族的歷史根源》（阮志宣 Nguyễn Chí Huyền, 2000）一書中，阮志宣還提到，除了一些有悠久歷史淵源的地方族群外，該地區的大多數族群都是從 10 世紀到 19 世紀從中國移民到越南的。這一點在一些學者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確認，例如畢日等（（Bê Việt Đăng）et al., 1971）、琴仲（Cầm Trọng, 1978）等人。在談論近代歷史時期中，越南北部山區苗族的跨國界族群關係時，除了談論移民問題外，王維光（Vương Duy Quang, 2005: 152-153）還指出，透過 1918 年發生在越南萊州省，越南苗族與寮國苗族共同對抗法國的 Vue Pa Chay 起義，來看他們之間的關係。

在 20 世紀 80 年代和 90 年代，越南的民族學界對當代跨國界族群關係的問題仍然關注有限，儘管 1979 年中國發起了越中邊境戰爭。在那個時期，相關的研究通常與國防有關。例如，在越南北部邊境高地國防背景之下，周泰山（Chu Thái Sơn, 1987: 285-298）研究了越中邊境兩側的民族文化現況和文化關係。他指出，在這個地區，通用語（越南語）流通性不佳，反而官話（漢語中的一個方言）被許多越南當地族群做為溝通的語言。

從 2000 年開始，越南民族學界，特別是民族學院（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開始更加關注邊境地區的少數民族研究，其中包括跨國界族群關係的討論。當年是國防安全有危機的時期，其中涉及寮國的北部地區，也包括越-寮的邊境地區。而在這種背景下，李行山（Lý Hành Sơn, 2008）提出「越南-寮國邊境地區族群關係」的研究，以及范光歡（Phạm Quang Hoan, 2011）提出「越南-寮國邊境地區苗族研究」的研究。同樣在此期間，在越-中邊境地區，兩國邊境關係基本上是友好的，因此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的民族學院和中國雲南省紅河學院在邊境地區共同進行相關的研究。在此合作下，王春

情 (Vương Xuân Tình, 2011) 研究了老街省 (Lào Cai) 哈尼族 (Hà Nhi) 村莊在越－中邊境地區的發展影響，而陳氏梅蘭 (Trần Thị Mai Lan, 2011) 則研究了越南和中國邊境地區的民族政策。由於邊境問題的重要性，從 2011 年至 2012 年，越南民族學院由范光歡教授主持進行了關於邊境的研究，以研究越南－中國，越南－寮國和越南－柬埔寨三個邊境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土地、文化等問題，而跨國界族群關係只是上述內容中的一部分。

從 2013 年至 2014 年間，越南民族學研究院進行了三個計畫，這個研究計畫有關三個邊境地區：北部山區、西原地區和西南部地區。接著，越南的跨國界族群關係的研究，其中也包括北部山區的研究，才真正開始推動。這些研究成果也已經正式出版。(王春情 Vương Xuân Tình、武廷梅 Vũ Đình Mười, 2016；陳明恆 Trần Minh Hằng、阮功草 Nguyễn Công Thảo, 2016；李行山 Lý Hành Sơn、陳氏梅蘭 Trần Thị Mai Lan, 2017)。上述研究涉及經濟、社會、文化、國防等領域，同時並探討此關係對越南發展之影響。

繼上述民族學研究之後，越來越多的其他研究，如：越－中跨國界族群關係在西北地區的研究 (豆俊男 Đậu Tuấn Nam, 2017)；跨國界婚姻 (鄧氏花 Đặng Thị Hoa, 2016)；跨國界移民 (武長江 Vũ Trường Giang, 2018)，其中包括北部山區的邊境地區。2017 年可以被視為民族學研究中第三次邊境發展的時期，透過舉辦全國會議「當今我國邊境地區和跨國界族群問題」(民族學研究所, 2018) 來證明這一點。會議重點關注邊境的研究理論及方法 (阮文正 Nguyễn Văn Chính, 2018)、跨國族群關係 (王春情 Vương Xuân Tình, 2018)，以及與邊境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和跨國界族群關係相關的許多報告。需要強調的是，這次會議是民族學研究院在中國、寮國、柬埔寨三國邊境地區進行多年研究的開端。因此，從 2021 年到 2026 年，民族學研

究院已經且即將繼續開展研究課題，從越—中邊境地區開始（2021-2022）；接下來是越—寮邊境地區（2023-2024）和越—柬邊境地區（2025-2026）。

如果僅考慮北部山區，除了越南的學者外，族群跨國界關係問題也引起了中國和其他國家研究者的關注，而研究都集中在越—中邊境區域。在研究這個區域時，學者們最關心的是跨國界勞工移工、跨國界婚姻和貿易。關於跨國界勞工移工，Wang（2019，90-94）、Zhou 及 Yumeng Zhong（2022：1-15）已提及，中國的工廠或企業裡有自由移工也有簽約移工的情況。其他學者如：劉曉雪（Luu Hiếu Tuyết）、顏泰芸（Diêm Thái Vân）、李國良（Lý Quốc Lương）和潘敏儀（Phan Mân Nghi）也具體介紹了越南邊境地區的少數民族自由勞工移工到中國廣西省種植甘蔗的情況（據黎玉兄 Lê Ngọc Huynh）、張文強（Trương Văn Cường，2021：604-613）。跨國界婚姻是一個熱門議題，已經持續了多年，許多學者和國際組織都關注（Maochun & Chen Wen，2014；Barabantseva，2015：57-81；UNFPA，2018；Huang，2020：77-85）。跨國界貿易問題，包括走私，尤其是在越中邊境地區，也引起了許多研究者的關注（Turner et al.，2015；Yin，2018：551-573）。另外，一些中國學者為了中國的「一帶一路」政策提供參考研究成果，所以也開始研究跨國界文化關係這個議題（Yan & Mingyu Xu，2018：411-415），此議題也或者被整合在上述領域的研究中。

1.2. 跨邊境族群關係研究論點

研究跨國界族群關係需要將邊界視為社會空間而非分隔之地。根據 Scott（2014）認為邊境社會空間具有適應外部壓力和相互作用的特徵。Turner（Turner，2010：265-287）也指出，跨國界貿易不受政治邊界的約束，而是受到跨邊境的文化社會關係（信仰、家族、婚姻）以及跨邊境的人口移動和經濟交流的影響。而 Faist（2016：1-36）卻

認為，跨國社會空間的術語不僅涵蓋國家之間的關係，還包括非政府間的關係。這些關係包括社會聯結（Social ties），例如個人、族群、宗教之間的聯結；以及象徵聯結（Symbol ties），即集體性、集體記憶和集體詮釋。

一些學者（如 Abraham 和 Van Schendel、Van Houtum 和 Struver、Thomas Nail）發展了第三空間（Third space）理論，即模糊空間（Ambiguous space），用於描述邊境地區。邊境地區的第三空間是指同時分隔和連接兩個國家的空間，由兩國確定的邊界產生。這個空間有四個特徵：第一，邊境地區居民對政治立場的看法模糊不清，因為他們會按照自己的利益去解釋和遵守法律；第二，邊界的移動性，即邊界可能因戰爭或自然變化（如河流流向改變）而變化；第三，人口流動的不穩定性使得邊境管理非常困難；第四，邊境分析不僅涉及空間和時間，還涉及居民的政治立場，因為政治立場構成了第三空間的本質（王春情 Vương Xuân Tình，2022：445-447）。

考慮到跨國界族群關係，需要採用國際民間主義（Banal cosmopolitanism，Everyday cosmopolitanism）的方法來接近，正如 Rowedder（2022）在寮國北部地區所做的研究，此觀點也在他的著作《寮國北部的跨國界貿易商人：小型貿易》（Cross-Border Traders in Northern Laos: Mastering Smallness）中呈現出來。Rowedder 認為，在選擇、購買和消費跨國貨物方面，基於「普通性」（Banal）的習慣已經深入到當地居民中。在這裡，學者結合了普通性和國際主義（Cosmopolitanism）的概念來研究寮國北部地區的商人的跨國界關係，這也是民族學研究邊境地區的一種方法。

2. 越南北部山區的各族群在東南亞大陸地區和中國南部歷史民族學中的角色

根據越南族群學和其他文獻的區域劃分觀念，北部山區包括和平省、山羅省、奠邊省、萊州省、安沛省、老街省、河江省、太原省、北件省、高平省、諒山省和廣寧省、北江省、福壽省、清化省、義安省的山區縣市。然而，這種觀念與越南政府制定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區域劃分不一致³。在北部山區提到的省份中，與中國接壤的有：廣寧省、諒山省、高平省、河江省、老街省、萊州省、奠邊省；與寮國接壤的有：奠邊省、山羅省、清化省和義安省。

在越南，邊境區域的觀念尚未統一。根據 2003 年的國界法，陸地邊境地區包括與陸地國界和河流邊境相接的社 (xã)、坊 (phường)、鄉鎮。然而，根據 2007 年政府「越—中邊境建設規劃至 2020 年」的規定，邊境地區包括與中國接壤的省份。同時，在 2009 年的越南—中國陸地邊境管理協定中，將邊境地區的定義為「兩國相接的邊境縣市等級的行政區域」（阮文正 Nguyễn Văn Chính, 2018: 27-54）。在本文中，有關越南跨國界族群關係的文獻和分析主要涉及邊境地區的省份和縣市中的社 (xã)、坊 (phường)、鄉鎮。若從省份層面來看，越南邊境省份與中國廣西省和中國雲南省共用邊境線；與寮國的各省份：Phongsaly、Luangprabang、Huaphanh、Xiengkhoang 和 Borikhamxay 共用邊境線。

³ 根據越南政府總理於 2022 年 4 月 20 日發佈的決議 495/QĐ-TTg，批准了 2021 年至 2030 年以及 2050 年願景下的北部區域內的中部地區和北部山區規劃任務，該地區由 14 個省份組成，包括諒山、高平、河江、老街、萊州、奠邊、山羅、北江、太原、北件、宣光、福壽、安沛以及和平。因此，廣寧省雖然擁有山區且位於北部區域內的中部地區，但並未包含在這個規劃中，因為該省屬於海洋經濟發展規劃。

境內分別屬於越中邊界省和越寮邊界省的邊境地區位於東南亞大陸地區，與中國南部地區有著密切關係，也是一個歷史學和民族學的地區。這裡是越—氓語系 (Việt - Mường)、傣—泰卡岱語系 (Tày - Thái Ka đai)、孟—高棉語系 (Môn - Khmer)、漢語系 (Hán)、苗瑤語系 (Hmông - Dao)、藏緬語系 (Tạng - Miến) 的一些族群居住地。根據一些研究，在中國南部有 12 個少數民族與越南邊境的少數民族有同族或相近的關係，如壯族 (Choang)、漢族 (Hán)、泰族 (Thái)、布依族 (Bố Y)、苗族 (Miêu)、瑤族 (Dao)、彝族 (Di)、哈尼族 (Hà Nhi)、拉祜族 (La Hủ)、仡佬族 (Ngật Lão)、京族 (Kinh) 和回族 (Hồi) (引自王春情 Vương Xuân Tình, 2014: 56)。越南北部山區邊境地區除了一些古老的族群如京(越)族、氓族、古傣族外，還有 20 多個在過去 1000 到 100 年間從中國移民到越南的族群 (阮志宣 Nguyễn Chí Huyên, 2000)。在越中邊境地區也有一些越南移民到中國的情況，但往往是零散的。從中國大規模移民到越南的人群，如苗族和瑤族，後來還有一部分人繼續遷移到寮國，甚至到泰國 (引自玉時佳 Ngọc Thời Giai, 2008: 59-68)。對於越中邊界地區的一些流遠流長的族群，如孟—高棉語系的一些族群，19 世紀末法國殖民暹羅國和大清帝國的邊界劃分已將這些居民劃分為兩個獨立國家的公民，但在共同的地理空間內相鄰。例如，在中國的莽族 (Mang) 和克木族 (Kemu) 與越南的莽族 (Mảng) 和克木族 (Khơ-mú) (王春情, 2014: 57)。在越寮邊境地區，寮族、泰族、苗族等族群已經出現了雙向的越南—寮國移民潮流 (由祈山縣共產黨部、祈山縣人民委員會, 1995; 李行山、陳氏梅蘭, 2017: 124-131)。

上述的族群歷史及移民歷史已形成了越南邊境兩側各族群的交錯分布。例如，在越南北部和東北部的邊境地區，傣族和儂族與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壯族同宗。在越南西北地區，如 Hà Nhi、Lô Lô、Phi Lá、La Hủ、Cống、Si La 族等族群與中國雲南省彝族 (Di) 自治區的

同宗。同樣地，越南的 Hmông 族也是與中國壯族自治區的苗族以及中國雲南省文山縣苗族同宗。而在越南－寮國邊境地區，越南邊境地區鄉鎮和市鎮的族群也都存在於寮國的邊境省份和縣市。

在自然條件方面，越南－中國邊境的東北部是低山區，海拔約 1,000 公尺；只有越南的茶江、羅江、甘江（sông Cháy, sông Lô, sông Gâm）的上游才有高於 2,000 公尺的山峰及 1,300-1,600 公尺的高原。越南－中國和越南－寮國邊境的西北部是廣大的山地和高原，由西北－東南方向平行的許多山脈構成。這裡有橫貫紅河的 190 公里的黃連山脈（Hoàng Liên Sơn），寬 30 公里，海拔 1,500 公尺以上，最高峰是番西邦峰（Phanxipăng），高 3,142 公尺。此外，還有馬江（sông Mã）流域的山脈，其中一部分從越南－中國和越南－寮國邊境到越南的奠邊省；第二部分屬於馬河上游和中游地區，延伸到越南的清化省和義安省。總的來說，上述地形在越南－中國和越南－寮國邊境的大部分地區形成了明顯的分割。這些邊境地區的鄉鎮和市鎮大多位於高山區域（海拔 800 公尺以上）（民族研究院 Viện Dân tộc học，1978：11-19）。

在這樣的地形條件下，越南邊境村莊的族群部落通常是以不密集的情形居住，每個村莊平均只有 50-60 個家庭。在 1979 年中國發動的中越邊境戰爭期間，許多村莊被破壞，居民被迫搬到內陸深處的地方。當 1979 年的邊境戰爭和隨後的衝突結束時，他們才回到舊村莊，但許多家庭仍然繼續居住在遷徙地點。例如，位於河江省渭川縣（Việt Xuyên）的 Lao Chải 鎮，大部分居民是苗族人，當我們 2022 年在那裡進行民族學田野調查時，那場邊境戰爭時期的彈藥和地雷仍然存在。

越南－中國、越南－寮國邊境地區居民的傳統生計主要是農業和利用天然資源生存。在陡峭的土地上，他們只種植穀物、玉米、樹薯和豆類來自給自足。在一些條件較好的區域，他們開墾梯田或在狹窄的山谷中種植水稻。畜牧業（畜養水牛、黃牛、馬）只在有草原的地

方發展，例如：義安省祈山縣的 Huồi Tụ 村、Mường Lông 等越—寮邊境苗族居住地，或中—越邊境的越南高平省重慶縣的一些山區鄉鎮區的傣族、儂族居住地。上述邊境兩地的手工藝業並不發展，只滿足了自給自足的需要。在邊境地區，特別是靠近關口地區的地方，已經出現了一些生意人，他們主要是販賣牛和小商品（阮玉清 Nguyễn Ngọc Thanh、玉詩（Ngọc Thi，1996：61-70；王春情，2011）。在邊界地區的資源開發行為，由於過度利用和某些資源被國家禁止開發，開發越來越受到限制。到目前為止，由於人口增長、單位耕作面積和資源減少，傳統生計已經無法滿足居民的需求，失業現象普遍存在。筆者將在後續部分中闡述跨越邊境部落關係要加強的原因。

越南北部邊境山區的少數民族不僅保留了傳統文化，還受到了兩大文化的影響，即來自中國的儒教和道教以及來自印度透過泰國和寮國傳播的佛教。總體來看，由於大多數居住在越中邊境地區的少數民族是從中國遷移而來的，因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中國文化影響。而在越寮邊境地區，一些少數民族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影響，特別是泰族和寮國族人。以前，在越中邊境地區的許多少數民族使用母語之外還使用中國南方漢語的方言—官話；而在越寮邊境地區，泰族語也是該地區許多少數民族使用的通用語言。直到 1945 年以後，越南語才逐漸取代了這兩種語言。

3. 國家邊界歷史和當代各國政策對跨越邊境的族群關係之影響

3.1. 國家邊界的歷史

當今越南的領土在歷史上形成已久，與獨立、自治的意識緊密相連。關於越南邊界問題，黎忠勇（Lê Trung Dũng，2016：32-41）認為，直到 19 世紀上半葉，越南人仍不知道邊界線的概念。有關越南

領土的資訊，直到後黎時期也只是指邊界方向，而沒有具體界定邊界線。到了阮朝時期，邊界方向被界定到了省、府、縣或地方這些級別。在這些邊界線上，有些標誌更加明確，如界碑、堡壘、關隘和自然邊界線。而以線狀邊界的形式來界定，只有法國人在 19 世紀末才開始在越南應用。1885-1897 年，越一中邊界線透過劃定界碑來明確分別，以 1885 年的天津條約、1887 年的邊界劃定公約和 1895 年的補充邊界劃定公約作為基準，這些公約是法國和清國政府之間簽訂的。與之前的歷史邊界相比，越南損失了近 2,000 平方公里的領土給中國，主要是在西北邊境地區。這是一個資源豐富、地理位置和軍事戰略重要的地區。儘管如此，法國和清國政府的界碑劃定確立了具有國際法律效力的陸地邊界線，有助於長期維持越中邊界的相對穩定，並為兩國之間的邊界線劃定打下了歷史基礎。

越南民主共和國（現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立於 1945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49 年成立。兩國政府已達成共識，尊重法國時期所簽訂條約下的邊界線，並簽署一些保護邊境和未決問題的協定。然而，在 1966-1979 年期間，由於兩國關係存在分歧，中國方面更頻繁地進行違反邊境的行為（非法入境、移動國界標誌、與越南邊防部隊發生衝突），並在 1979 年發動邊界戰正、侵略越南。1980-1999 年期間，越南和中國為了解決兩國陸地邊界問題，以法國時期法國和清國所訂出的邊界線為基礎下不斷進行談判。2000-2009 年，兩國完成了邊境標誌的埋設和修建。現在的越中邊界線是經過上述過程所達到的結果（丁光海 Dinh Quang Hà, 2022 : 233-250）。

越南—寮國邊界線是在法國統治東洋屬地時期形成的。越南和寮國之間的邊界是根據東洋屬地總督的多項決議確定的，分別是 1893 年、1895 年、1896 年、1900 年、1904 年和 1916 年。這些決議在東洋屬地地理調查處的比例尺為 1/100,000 的 Bonne 地圖上得以表現。

1975 年以後，東洋地區的戰爭結束後，越南和寮國兩國就邊界和領土進行了談判，一致同意採用 1945 年東洋地理調查處印製的 1/100,000 比例尺的 Bonne 地圖解決兩國之間的邊界問題。對於 1945 年東洋地理調查處地圖沒有訂出的地方，就使用之前或之後幾年的地圖。從 1977 年到 2016 年，兩國政府簽署了關於邊界問題的協議和議定書，完成了界線劃分、界樁的埋設，修整並增加了邊界線上的界樁。多年以來，越南－寮國邊界是和平友好的，沒有發生爭議（越南－寮國國家邊界形成和解決過程 *Quá trình hình thành và giải quyết đường biên giới quốc gia Việt Nam - Lào*，2017）。

目前，越南與鄰國之間的陸地邊界上有三種過境關口：國際過境關口、國家過境關口以及輔助過境關口（Auxiliary crossing）－即省份等級、位於深山、偏遠地區的過境關口，僅供當地居民使用紙本通行證跨越邊境。在越南與中國的北部山區邊界上，共有 5 個國際過境關口，15 個國家過境關口和 4 個輔助過境關口；寮國的情形也類似中國，有 5 個國際過境關口，2 個國家過境關口，但沒有輔助過境關口。然而，當地居民還可以透過許多路徑輕鬆地穿越邊境。例如，在諒山省（Lạng Sơn）高祿縣（Cao Lộc）有 16 條這樣的道路。在某些道路上，可能會有兩個國家的邊境站，當地居民只需出示通行證即可通過這些邊境站。如果居民穿過沒有邊境站的道路，將被視為違法越界。

3.2. 當代國家政策影響跨國界族群關係

由於邊境地區在貿易和國防安全方面的重要性，越南、中國和寮國三個國家都關注該地區的發展。這種關注體現在各國邊境地區的經濟社會政策和族群政策以及國家間的合作發展中。

僅在過去 20 年左右的時間裡，越南已有許多與越中邊境、越寮邊境以及邊境地區各族人民發展相關的政策。對於越中邊境地區，2003 年，越南政府首相頒佈了 120/2003/QĐ-TTg 決議，批准了到 2010 年

越中邊境經濟社會發展策略。根據該策略，越南將在邊境鄉鎮建設基礎設施，幫助貧困家庭蓋房子，並支持那些在邊境附近定居的家庭。2007年，越南首相又頒佈了1151/QĐ-TTg決議，批准了越中邊境地區建設規劃到2020年，將該地區轉變為綜合經濟區，以關口經濟和採礦工業為主要經濟產業。對於越寮邊境地區，2008年，越南首相頒佈了864/QĐ-TTg決議，批准了該地區建設規劃到2020年。2010年，越南首相再次頒佈482/QĐ-TTg決議，關於越寮和越柬邊境地區對外經濟發展政策機制。此外，越中邊境和越寮邊境還實施了許多與越南邊境地區相關的政策，如2006-2010年和隨後幾年的陸地邊境巡邏道路建設規劃，越南關口經濟區開發計畫到2020年，以及越南邊境商貿基礎設施發展計畫到2025年和2030年的願景等。

在中國，到目前為止已經有三個涉及邊境族群的重大政策。第一個是中國實行政改政策，開放邊境、發展少數民族經濟。據此，與越南接壤的兩個省份—廣西和雲南，有5個城市向越南開放，分別是廣西省的東興市、憑祥市以及雲南省的和河口市、文定市、瑞麗市。第二個是實施「振興邊疆富民」計畫（穩固邊疆、富裕人民），也稱為中國邊境發展計畫，該計畫於1999年開始實施，旨在為邊境地區提供更多、更強有力的投資和支援。該計畫的任務是集中幫助少數民族，特別是人口較少的民族。第三個是實施尊重少數民族文化的政策，建設「萬里邊疆文化走廊」，在其中推動文化保護、發揚文化特色，並將文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結合，特別是在旅遊業方面（丁光海 Dinh Quang Hai, 2022: 290-301）。此外，中國邊境地區和邊境民族政策與中國「一帶一路」政策相結合（Yan & Mingyu Xu, 2018: 411-415；范清恆 Pham Thanh Hằng, 2021）。

越南與與其接壤的國家開展邊境地區合作，這些國家與越南北部山區邊境地區有密切關係。因此，越南已經與中國和寮國簽署了許多

文件，以合作開發和管理邊境地區。這些文件涉及國界規劃、實地劃分和國界標記、國界規章制度、越南、寮國、中國邊境線交點的確定、邊境和關口管理規章、邊境貿易協定等問題。除了中央政府外，越南邊境省份還與中國和寮國的地方政府簽署了合作協定。例如，到 2022 年，越南廣寧省已經與中國邊境地區的地方政府簽署了 26 個省級協定（促進越中邊境貿易發展 *Thúc đẩy phát triển thương mại biên giới Việt - Trung*，2022）。

以上政策對越南北部山區邊境地區的跨國界族群關係在貿易、勞動移工、婚姻和其他領域產生了影響，筆者將在下一部分進行闡述。

4. 跨國界貿易

關於跨國界族群關係，筆者僅針對人們的小規模生意行為進行闡述。考慮到跨國界小規模生意行為的重要性，Rowedder (2022) 認為，這種貿易維持了邊境地區人們的生計和日常生活。換句話說，正是這種「普通」的小規模生意為跨國界商業關係的維持做出了貢獻。因此，它基於當地機構 (Local institutions)，更確切地說是基於族群機構 (Ethnic institutions)。小規模生意，即那些「普通」的事物可以跨越邊界障礙，甚至在邊境衝突或戰爭條件下仍然存在。Turner (Turner, 2013: 9-24) 還指出，跨國界小型商人有靈活的方法來克服小型關口，或者用非法的路線和走私貨物，以維持生計。越南和中國邊境歷史研究中，Anderson (Anderson, 2013) 認為，在越南—中國邊境的現代時期，當地居民透過商業和文化活動相互作用，在最緊張的時刻也是如此，這與 Womack (Womack, 1994: 496) 的觀點相同。Yin (Yin, 2018: 551-573) 還指出，越南和中國跨國界走私的貨物由商人歷史上即已開始，至少在 20 世紀的前半期非常活躍，甚至延續到本世紀 70 年代。

邊境地區少數民族的跨國界貿易行為主要透過本地市場進行，在這裡進出主要依靠通行證，這種文件即在鄰國境內的 9 點至 21 點之間允許通行的通行證。該文件可以在邊境地區的鄉鎮、街道或市鎮警察局領取，有效期為 12 個月。在越南－中國邊境地區，自兩國於 1991 年關係正常化以來，越南建立和恢復了大約 200 個市場。這些市場位於交通樞紐、縣市、鄉鎮和村莊的中心（謝氏心 Tạ Thị Tâm，2021：383-396）。許多地方，尤其是關口地區，在邊境兩側都有市場。而在中國，截至 2010 年 5 月，與越南的邊境上有 54 個市場，其中 25 個位於廣西，29 個位於雲南（何秋水 Hà Thu Thủy、何廷成 Hà Đình Thành，2020：352-379）。然而，少數民族生意人的買賣行為較少在大型關口的市場進行。例如，在越南的老街關口和廣寧省的國際關口，生意人通常是京族人（Endres，2015：710-741；謝氏心 Tạ Thị Tâm & 李錦繡 Lý Cẩm Tú，2018：343-355）。在越南－寮國邊境地區，由於經濟和商業交流不太活躍，市場數量較越南－中國邊境地區少。

在偏遠的邊境地區居住的居民，邊境市場已經成為交易的場所。由於許多中國商人來到越南市場做買賣，越南少數民族的跨國界貿易也有了更多的機會。在邊境市場，如越南老街省 Si Ma Cai 縣主要販售牛隻的 Cán Cầu 市場，苗族商人主要靠著在越南和中國的親戚關係、姻親關係及同族關係建立起跨國界貿易的聯繫（Tunner et al.，2015；謝氏心 Tạ Thị Tâm，2021：383-396）。據（王春情 Vương Xuân Tình，2011：95-97）所述，在 2000 年初，越南老街省 Bát Xát 縣 Y Tý 社中的一個哈尼族（Hà Nhi）村莊已經有一個由 10 多名女性組成的跨國界貿易團隊。她們帶著通行證，通過兩國邊境站進入中國。她們每兩天就會前往中國市場出售各種貨物，如蔬果、草藥、布料、繡線和越南製造的勞動工具。銷售後，她們再購買中國市場上的商品，如衣服、除草劑、醫療藥品和農具，然後將其帶回 Bát Xát 縣的 Y Tý

市場或 Mường Hum 市場出售。據一位專門從事跨國界貿易的女性透露，她主要跟 6 個中國人進貨，其中 4 個是哈尼族人、1 個瑤族人和 1 個苗族人。此外，在 Y Tý 市場，還有中國商人與越南人之間的貿易網絡。在 Y Tý 市場，中國商人的交易夥伴通常也是該地區的少數民族，如哈尼族、苗族和瑤族。因此，越南和中國的各個族群之間形成了一個貿易社交網絡。當與不同族群的人交流時，他們使用官話。在越南－寮國邊境地區的三個省份：Luangprabang 省、Phongsaly 和 Huaphanh 省的市場中，有超過 40% 的雜貨店是越南人經營的，其中許多雜貨點老闆是生活在越南山羅省和奠邊省的寮族人（陳氏鳳 Trần Thị Phượng、范文力 Phạm Văn Lực，2018：270-279）。

越南－中國和越南－寮國邊境的跨邊境貿易非常普遍，尤其是家畜和家禽的貿易。根據 Turner 和他的同事表示，在 2007 年之前，中國雲南省的水牛通常被帶到越南出售。2007 年後，中國對水牛肉的需求增加，因此越南的水牛又被帶到中國出售。因此，跨國界水牛貿易網絡形成了，尤其是在苗族族群中較常見。在水牛貿易中，族群和語言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多數貿易商都在政府無法控制的危險地區的小路上行駛。他們所獲得的利潤要比通過關口高得多（Turner et al., 2015：80-82, 140-141）。同時，謝氏心（Tạ Thị Tâm, 2021：383-396）也統計出位於老街省 Si Ma Cai 縣的 Cán Cầu 市場一個苗族人的水牛貿易網路中，共有 77 人，其中 57 個人是同一族的人，另外 7 個人在中國。筆者於 2019 年對越南高平省邊境地區的研究中，也瞭解到當地的農族人經常與中國的農族人合作進行非法的水牛貿易。他們的手段是在邊境附近飼養水牛，趁著邊防部隊不注意時將水牛趕到中國賣掉，在中國邊界已有人隨時準備接收。

越南義安省 Kỳ Sơn 縣和奠邊省 Mường Nhé 縣的苗族人與寮國的苗族人交易水牛和黃牛。這種貿易不僅在邊境地區發生，也在寮國

的內陸地區發生。2012年，義安省 Kỳ Sơn 縣邊境的一個苗族村莊，有大約 50 名專門與寮國的苗族族人貿易水牛和黃牛的人。每一趟去做生意持續 3-4 天，甚至數十天，同時可獲得數百萬越南盾的利潤（王春情，2014：179-180）。這兩個省的苗族人還與寮國和美國的苗族人合作，生產傳統的苗族服裝進行銷售（范光歡，2011：62-63）。

2015 年，中國廣西省人民委員會提出了在邊境地區建設邊境牆的草案，現在，建造邊境牆的工程已在越南—中國邊境地區的許多地方開始進行。因此，透過走私這條路的貿易行為已經減少。然而，在越南—寮國邊境地區，這種非法交易仍在繼續。對於上述跨國界貿易的預測，Yin（2018：551-573）認為，在中越邊境的國家和走私販之間的鬥爭不會停止。這種非法經濟活動的起源在於中國需求量大。如果中國政府不能滿足中產階級的消費需求，那麼進口商品將繼續以走私的方式進入中國，而越南仍將是非法貿易的中轉站。因此，也將導致越南—寮國邊境地區的走私行為持續進行。

5. 跨國界勞動移民

根據中國一些研究學者的說法，勞動移民是越南—中國邊境地區自 2000 年至 2019 年（中國武漢肺炎疫情爆發前）的熱門問題。這是一種單向移民形式，也就是從越南到中國，主要原因是經濟條件差異和中國勞動力短缺，特別是在廣西省。在 2000 年至 2010 年間，廣西省非法入境勞動力人數已超過 50,000 人。自 2017 年起，廣西省政府已經與越南邊境的一些省份的人民委員會簽署協議，招募勞動力，可工作時間為期一個月。勞動力之所以短缺的原因是廣西省的大多數年輕人已經前往中國沿海城市工作；而農村地區主要剩下老人、弱勢族群和兒童。另一方面，當地居民得到了政府的許多補助，因此有資金雇用越南勞動力，這比雇用中國勞動力更便宜。在越南北部山區，經

濟增長速度比廣西省和中國其他省份慢，因此也吸引了越南勞動力到中國那些地區 (Wang, 2019: 90-94; Zhou、Yumeng Zhong, 2022: 1-15)。也如同 Lee (Lee, 1996: 47-57) 對移工本質的觀點，正是建立在資源分配以及收入平衡之基礎上。

在越南，有許多與越南－中國跨國界勞動移工相關的研究，但這些問題的資料因研究內容和地域而異。根據武長江 (武長江 Vũ Trường Giang, 2017: 40-48) 的說法，自 2011 年至 2014 年，約有 200,000 人非法在中國工作，其中 45% 以上為越南少數民族。而在有關越南北部山區跨國界族群關係的研究中，李行山 (Lý Hành Sơn) 和陳氏梅蘭 (Trần Thị Mai Lan) (Lý Hành Sơn & Trần Thị Mai Lan, 2017: 111-114) 指出，自 2010 年至 2013 年，有 8,764 人次苗族、泰族和哈尼族人從越南奠邊省到中國打工；同樣，在越南高平省，自 2011 年至 2013 年有 6,529 人次到中國打工。

在 2015 年對越南－中國及越南－寮國邊境 7 個民族的 1,395 戶家庭的調查中，鄧氏花 (Đặng Thị Hoa, 2021: 479-501) 也提供了許多資訊，皆顯示出在調查前的 12 個月內，大部分戶長都有在中國工作的紀錄。其中，苗族人的戶長，在中國工作的比例為 37.2%、儂族人為 15.1%、傣族中人為 14.9%。而關於家庭成員在過去 12 個月中前往中國的情況，儂族人占了 61.7%、苗族人占了 55.8%、傣族人占了 48.2%。若按省份計算，高平省和諒山省 (越南－中國邊境地區) 的人口越過邊境的比例最高，分別為 93.2% 和 85.6%，其中大部分是為了打工的目的。研究還顯示出，越南－中國邊境的勞動移工比越南－寮國邊境地區更加普遍。

透過 2021 年位於老街省 Bát Xát 縣 Quang Kim 社的兩個熱依族 (người Giáy) 村莊的就業調查，黎玉兄 (Lê Ngọc Huỳnh, 2022: 241-254) 表示：自 2013 年以來，當地居民就已經前往中國工作。從

2015 年到 2020 年，每年約有 80% 的勞工在中國工作。勞工須經過邊境關口入境，如果是當天來回，則使用通行證，如果是長期工作，則需要護照。他們從事許多工作，例如：照顧小孩、餐廳服務員、銷售人員、飯店工作人員。有一些身體健壯並能說中國普通話的人則去中國內陸的省份工作，每個村莊有 20 至 40 人。他們的收入取決於工作內容。照顧小孩每個月可領到 1,500-1,800 元人民幣（5,500,000-6,500,000 越南盾）；服務員有 2,000-3,000 元人民幣；工人有 3,000-4,000 元人民幣。王春情（Vương Xuân Tình）、武廷梅（Vũ Đình Mười）和黎明英（Lê Minh Anh，2015：7-24）在諒山省高祿縣 Pò Cại 社的一個傣族村莊進行的研究也表明，農閒時期，村莊常有數十人會去中國打工。在 2020 年的田野調查中，我們得知越南高平省 Trùng Khánh 縣 Đàm Thủy 社的一個農族村莊裡，在中國武漢疫情爆發之前，該村莊每年有約 300 人前往中國打工。

搬運貨物跨越過邊境的搬運工在越南－中國地邊境區域也很普遍。2013 年，位於老街市的 Hợp Thành 社有數百人每晚到 Nậm Thi 河搬運貨物過岸，平均收入為 700,000-800,000 越南盾。2018 年，在廣寧省 Bình Liêu 縣的橫模關口（Hoành Mô），這個行業的從業者中有大約 1,000 人是傣族、瑤族、高欄－山澤族（Cao Lan - Sán Chi）。他們組成了搬運組，使用拖車運輸貨物，每天的收入約為 200,000 越南盾（Trần Thị Mai Lan，2022：205-218）。在 2019-2020 年間的 Bảo Lạc 縣和 Trùng Khánh 縣的研究表明，Lô Lô 族、傣族和農族的人們也經常參與越過邊境的搬運工作。有的時候，Trùng Khánh 縣 Đàm Thủy 社農族人的一個村莊內有數百名勞動者去邊境從事搬運貨物的工作。

針對中國廣西省吸引越南勞工前往的原因，黎玉兄和張文強（Lê Ngọc Huynh & Trương Văn Cường，2021：604-613）指出：自 2000 年以來，中國廣西一直是中國最大的甘蔗種植區之一，擁有最大的甘蔗

種植面積和產量；而該省的幾個地區，例如：崇左、南寧和來賓則擁有更多的甘蔗種植面積和產量。例如，在 2013 年的甘蔗季節，廣西省種植面積為 1,704,100 公頃，產量為 11,926,350 噸，占中國全國甘蔗產量的 70%。2018 年的資料顯示種植面積為 1,405,840 公頃，產量為 10,938,810 噸，占了全國產量的 60%。甘蔗採摘季節從 11 月中旬到次年 3 月。由於三個接壤邊境的城市——憑祥、百色和東興——每天需要 1,500 萬名勞工，這些地區因年輕人外出謀生和中國「每對夫妻只能生育一個孩子」的政策而缺乏勞動力。在 1998-1999 年期間，當地居民通常請越南親戚來幫忙，之後透過支付工資改變了這種情況。學者也指出，在這裡打臨時工的小組中，每組通常有 8-15 名工人，工作時間為 3-4 個月。越南甘蔗採摘工人有大約 8-10 萬人，主要是邊境地區的少數民族，教育程度較低。2018 年，每天採摘甘蔗的工資約為 130-160 元人民幣（約 50 萬越南盾），比 2015 年翻了一倍（70-80 元人民幣）。而在越南，每天的工資通常只有 15-20 萬越南盾。

姻親關係也與工作和移工緊密相關。根據鄧氏花（Đặng Thị Hoa, 2021: 479-501）表示，與中國人有姻親關係的家庭中，前往中國邊境工作的可能性比那些沒有姻親關係的家庭高出 1.8 倍。移工不僅來自貧困家庭，還來自富裕家庭。王春情（王春情, 2020: 24-39）也指出，跨越越南—中國邊境的就業網絡包括個人網絡和家庭網絡；其中，個人網絡通常依賴於同族關係，而家庭網絡通常依賴於家族關係，家庭網絡較穩固但無法產生新的人脈，不同於個人網絡。

跨越越南和中國邊境的少數民族移工大部分是非法的。鄧氏花的研究結果（Đặng Thị Hoa, 2021: 479-501）指出，以儂族人來說，走小路境的人占 90.8%；以傣族人來說，比例為 70.0%，而苗族的比例則為 45.1%。自 2009-2010 年以來，中國廣西邊境管理局已逮捕了 1,820 名非法入境者，阻止了 4,839 人入境，並將 2,218 人遣送回越南。在

中國廣西的一所監獄中，非法的越南勞工拘留人數曾一度高達 10,000 人（Trần Thị Mai Lan，2022：205-218）。自 2017 年以來，中國廣西政府已與越南邊境的一些省份共同核發勞動許可證，但許可證僅在 30 天內有效，而且每次重新簽訂合約需要支付 200 元人民幣的費用，造成崇左市的各個工廠內的跨國界勞動者每個月離職率高達 216%，除了勞動許可證的影響外，這種高離職率也受到長年以來都有非法跨國界移工現象的影響（Zhou & Yumeng Zhong，2022：1-15）。

中國武漢肺炎疫情大爆發也影響了越南－中國跨國界勞動力。例如，在老街省 Bát Xát 縣 Quang Kim 社熱依族的兩個村莊裡，疫情大爆發前，有 80% 的勞動者在中國打工，之後許多人失業。邊境運輸貨物的搬運工也遇到了類似的情況。甚至在中國關閉邊境關口後，種植蔬菜、辣椒、水果以及雞鴨養殖等農業家庭也無法將產品銷售到中國。中國關閉邊境關口造成勞動力短缺，因此沒有足夠的勞動力將中國的甘蔗種植農場整個面積完全種植，導致甘蔗產量減少。（Lê Ngọc Huynh，2022：241-254；Hoàng Thị Lê Thảo & Lý Việt Trường，2021：278-291）。

越南－寮國邊境的跨國界移工流動情形不像越南－中國邊境那麼頻繁，主要是以越南京族為主。他們主要集中在寮國首都永珍和一些中部、南部的省份工作。自 2000 年以來，到寮國的越南移工人數已增加，包括合法和非法移工，這是因為在邊境地區的出口、人口和貿易活動較頻繁。2006 年，在寮國有約 10,000 名越南自由勞工，到 2015 年暴增且超過 60,000 人。寮國的越南自由移工在尋找工作和收入方面面臨許多困難。儘管寮國政府已經為越南人制定了許多條件較好的政策，但自由勞工的生活和工作條件仍然存在很多困難（Pham Thị Mui，2019：462-472）。

6. 跨國界婚姻

跨國界婚姻是全球化過程中自然而然的趨勢和現象。長久以來，由於邊境兩側族群之間密切的關係，早已影響了越南北部山區婚姻的類型。越南－中國邊境地區的跨國界婚姻在 1991 年兩國邊境重新通商之後，開始蓬勃發展，同時，這個情形和中國的國家發展政策，尤其是邊境地區的發展政策密切相關。

到目前為止，有不同的管道統計越南和中國邊境地區的少數民族婚姻數量，但都有不同的答案。由於大多數這樣的婚姻是非法的，導致這些數據遠遠與實際情形有很大的落差，因此很難進行統計。根據聯合國人口基金會（UNFPA）（2018）的資料，在 20 世紀 80 年代末期，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步成功以及中國－越南雙邊關係的日益密切，特別是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使得中越跨國界婚姻逐漸增加。根據初步統計，至少有 112,000 名越南人嫁到中國雲南和廣西的邊境地區、沿海省份如廣東、福建和浙江以及內陸地區如河南、湖南和江西等省份。2000 年後，邊境地區的婚姻數量在廣西減少，但在河北省和中國其他一些內陸省份卻增加了。透過各種資料的彙整，鄧氏花（Đặng Thị Hoa, 2017: 739-752）表示，到 2013 年，估計有大約 50,000 名越南婦女嫁給了中國廣西、雲南和廣東的人。根據鄧氏花 2014 年和 2015 年的調查結果顯示，越南女性已結婚名義移民中國的時間主要是從 1990 年到 2005 年。例如，在越南高平省，從 1991 年到 2013 年有 4,726 名女性嫁到中國。然而，李行山和陳氏梅蘭（Lý Hành Sơn & Trần Thị Mai Lan, 2017: 138-152）提供了不同的資料：從 1990 年到 2009 年，在越南高平省有 1,230 名女性嫁到中國；從 2010 年到 2013 年 9 月，越南女性嫁到中國有 200 多例。然而，在 2020 年，在調查越南 Trùng Khánh 縣 Đàm Thủy 社的一個儂族村莊時，我們得知，如果僅計算年齡在 100 歲以下的人，該村莊有超過 100 人與中國的同族人結婚，其中

這種婚姻關係的結婚潮流高峰是在越中邊境重新開放通商之後的 1991 年。這表示，政府的統計資料往往與實際情況相差甚遠。

近 30 年來，跨越越南和中國邊境的婚姻傾向於單向和單性別，也就是說，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有越南女性嫁給中國男人（UNFPA，2018；Đặng Thị Hoa，2017：739-752）。關於原因，大多數學者都認為，主要原因是因為越南經濟條件貧困。反觀中國，由於早期實行改革開放，邊境地區比越南有更好的發展條件。因此，大多數越南女性在中國找丈夫是為了尋找比家鄉更好的物質生活。另一方面，中國農村和邊境地區的貧困男性普遍難以找到妻子，因為受過高等教育且身體健康的女性通常去城市工作。與此同時，來自中國其他地方的女性不願意嫁到偏遠的邊境地區。在某些地方，娶越南妻子的成本只有娶中國妻子的 1/2 或 1/3。許多人還提到了中國實施每對夫妻只能生一個孩子的政策及重男輕女的觀念導致性別失衡的原因。這種失衡導致男女比例失調，使得適婚年齡的男性很難找到妻子（Wang，2019：90-94；Đặng Thị Hoa，2017：739-752）。

除了上述兩個主要原因之外，也有人認為，越南邊境地區的婦女已經「過了適婚年齡」，也就是超過 25 歲很難在越南當地找到丈夫，因此跨國界婚姻成為了她們的婚姻解決方案。此外，也有一些人還癡想嫁給中國人是一件好事。在 2000 年初，越南老街省 Bát Xát 縣 Y Tý 社有些哈尼族婦女離開家鄉嫁給中國人；特別是有些人已經結婚並生育多個孩子，甚至有孫子、孫女了，仍然在中國找到新丈夫。對於這一種現象的解釋是，越南當地居民認為，一位中國的哈尼族男歌手的影片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位男歌手長得很帥，演唱了一些哈尼族的民歌，使人沉迷，而且每個家庭都有他的錄影帶（Wang，2019：90-94；Lý Hành Sơn & Trần Thị Mai Lan 合著，2017：138-152；Vương Xuân Tình，2011：54-58）。深入研究越南女性嫁給中國丈夫

的原因，Huang（Huang，2020：77-85）卻認為，她們不僅克服了貧窮和年齡過大的身份，而且這是她們的生存策略。這適用於因貧困、年齡大、教育低或離婚而難以在越南再結婚的女性。對於想要與中國男人建立穩定關係並在中國生活的越南女性來說，她們大多數必須接受未登記的婚姻。在中國和越南有一些言論中，將這些越南女性描述為「被販賣的受害者」、「非法新娘」或「妓女」，和這種論點相反，其實這些女性已經掌控了自己的移民行為和與中國男人的關係。

當研究越中跨國界婚姻背景的 275 名越南女性時，鄧氏花（Đặng Thị Hoa，2017：739-752）表示，由於做生意或雇傭關係，讓雙方有婚姻關係占最高的比例，有 44.7%；其次是透過相親和媒人介紹，佔 19.3%；透過遊玩或逛街，佔了 14.5%。在上述女性中，有 82.6% 在結婚前從事農業且收入不高。就年齡而言，18-25 歲的人最多，但被認為太老的 26-35 歲的人也占 30.4%。同族婚姻的數量與不同族婚姻的數量高達近 6 倍。因此，傳統和文化因素對跨國界婚姻狀況有很大的影響。關於上述婚姻的看法，85.2% 的儂族人認為這是正常的，而傣族人認為這是正常的比例為 75.3%，苗族人認為這是正常的比例為 72%。另外，跨國界婚姻的婚禮儀式通常很簡單。根據阮氏明黎（阮氏明黎，2018：788-798）表示，這些婚禮並沒有迎娶新娘的儀式，女方家只是準備了一些飯菜來通知親戚朋友。一些幸運的女方家會有新郎家來提親並給了一些聘金。在中國這方，新郎家也沒有舉行完整的傳統婚禮，而是將許多儀式簡化。

研究越南－中國邊境兩個瑤族村莊之間的婚姻，Barabantseva（Barabantseva，2015：57-81）認為，這裡的婚姻不僅遵循著古老的傳統習俗，而且還因為中國經濟的發展而得到了推動。在 2000 年之前，中國境內的瑤族男子和越南村莊中的瑤族女子結婚被認為是按照傳統習俗進行的。當時，越南女子嫁給中國男子可以很容易地登記戶

口，只需繳納一筆罰款即可。隨著跨國界婚姻數量的增加，這被認為是非法的。例如，2012年在某個地區有大約1,000對這樣的夫妻。有一段時間，中國當地政府曾經逮捕了那些非法婚姻的越南女子並將她們遣返回越南，但是後來她們又回到了中國的丈夫家。從2007年開始，罰款增加了，讓這些女子登記戶口很困難。2012年，一名男子有一個越南妻子，但妻子沒有登記入戶口，當要替孩子辦理戶口時，他要承擔10,000人民幣的罰款。然而，這些瑤族女子認為，她們並不是移民結婚，而是按照祖先的傳統習俗結婚。根據她們的說法，「移民」只是國家的說法。最近，中國已經簡化了與越南女子結婚的手續，但仍然很複雜。中國相關單位也認為，如果簡化了入籍手續，將難以阻止越南人的移民潮，影響到中國的人口和國防安全。在研究跨國界婚姻的法律方面，李行山（Lý Hành Sơn & Trần Thị Mai Lan, 2017: 138-152）也指出了沒有登記結婚的情況。例如，在諒山省，從1990年到2011年，來自邊境縣區包括長定、文郎、高祿和祿平的3,004名婦女嫁給了中國男子，但是只有4名向政府登記。

有關越中跨國界婚姻的後果評估，Wang（2019: 90-94）認為越南女性與中國男性結婚並沒有突破性的改變，只是從貧困到另一種貧困狀態，因為丈夫家庭的經濟條件通常處於村莊的貧困水準。此外，她們還面臨許多關於入籍的困難。但是，UNFPA（2018）的看法較樂觀。該組織認為，中國和越南政府已經合作解決非法問題，包括假結婚和販賣婦女。總體而言，這些越南女性在她們的家庭生活以及政府的政策方面已得到不少利益；但是，她們仍然面臨融入社會和就業的挑戰。根據UNFPA的說法，若想改善這種情形，需要簡化婚姻登記手續，讓行政程序簡單又便利。

在越南－寮國邊境地區，跨國界婚姻仍然按照傳統雙向發生，即兩國男女都互有嫁娶。例如，2010年，在越南奠邊省的奠邊縣和

Mường Nhé 縣有 26 名苗族男子娶寮國的同族人為妻；在寮國，有 21 個苗族男子娶了越南的同族人為妻。2013 年，寮國的 41 名泰族人和 Kho-mú 人嫁到越南奠邊省的奠邊縣。然而，他們的婚姻大多是按照傳統方式進行，也就是只得到家庭、親戚和村莊的認可，而沒有向政府登記結婚（Lý Hành Sơn & Trần Thị Mai Lan, 2017: 138-152）。

7. 跨國界犯罪

有許多跨越越南北部山區邊境的犯罪行為，但在這裡，筆者只提到毒品交易、人口販賣和政治犯罪。

在毒品交易方面，越南北部山區邊境的越南－寮國和越南－中國都非常地頻繁。在 2010 年起，越南－寮國邊境地區每年平均有約 4,000 起抓捕行動，抓獲超過 5,000 人。從 2010 年至 2019 年，在與寮國邊境的省份中，警方起訴了 28,298 起毒品犯罪案件，逮捕了 36,451 人，查獲了總共 2,263 公斤的合成毒品和 2,950,581 顆合成毒品，以及其他許多證據。這些毒品通常從金三角地區（與寮國、泰國和緬甸接壤）經過寮國的中北部，然後集中在 Luangprabang 和 Huaphanh 省，然後運往越南山羅省的雲湖縣和木州縣，以及其他省份如奠邊、清化和義安銷售。許多毒品交易是由兩國的泰族和苗族的人進行的。他們組織成 5 人至 10 人的小組，甚至有 20 人的小組，越過越南－寮國邊境將毒品帶入越南。例如，在 2013 年的「086 LV」行動中，越南警方與寮國警方合作，逮捕了居住在寮國 Phongsaly 省的 Lý Tùng Nhia，他將 34 塊海洛因磚和 15.3 公斤的海洛因粉末運往越南。同年，越南警方逮捕了在山羅省木州縣的苗族人 Tráng A Tàng 和另外兩人，他們將 1,800 塊海洛因磚從金三角地區帶回越南。當中國武漢肺炎大爆發時，越南－寮國邊境的毒品交易減少了，但在疫情過後，毒品交易又增加了。2022 年，越南警方統計出有 26 個犯罪組織非法購買、運輸毒品從寮國進入越南銷售（Lý Hành Sơn & Trần Thị Mai Lan, 2017: 184-

187；雲慶 (Vân Khánh, 2020)；阮銀 Nguyễn Ngân, 2022)。

越南和中國邊境也被認為是毒品犯罪行為的重點地區。毒品被從金三角地區運往越南，然後繼續運輸到中國。然而各種合成毒品都是從中國再運輸到越南。有時，從中國進口的合成毒品占國內毒品消費量的 90% 以上（越中邊境的合成毒品困擾 *Nhức nhối ma túy tổng hợp trên biên giới Việt - Trung*, 2016 年）。

在越南與寮國和越南與中國的兩個邊境地區，許多少數民族居民參與販賣毒品。在 2012 年至 2014 年期間，就有 9,371 名少數民族居民違法販賣、運輸、藏匿毒品，占總毒品犯罪嫌疑人數的 16.8%，比 2009 年至 2011 年期間增加了 43%。在越南北部的一些山區省份，毒品犯罪嫌疑人中少數民族的比例非常高，例如萊州省 1,709 名犯罪嫌疑入中，有 1,465 名少數民族，占 85.7%。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其他省份，例如：奠邊省 2,054 人中有 1,718 人，占 83.6%；山羅省 2,533 人中有 1,600 人，占 63.6%；高平省 983 人中有 560 人，占 56.9%；諒山省 1,338 人中有 564 人，占 42.1%；義安省 2,719 人中有 822 人，占 30.2%。在萊州省，對於大型毒品案件，被捕的 100% 人都是少數民族（武長江 Vũ Trường Giang, 2018：148-154）。

至於跨國界販賣人口的問題，如果僅計算 2008 年到 2014 年 6 月底，在越南共發生了 2,390 起案件，一共涉及 3,961 名罪犯，騙取了 4,721 名受害者。其中，越中邊境發生了 1,720 起案件，占了案件總數的 72%，執法部門已調查出 21 個跨省分、跨縣市的犯罪集團。在越南—寮國邊境發生了 142 起案件，占總數的 6%。人口販賣活動包括買賣婦女、少女，將其送進妓院；買賣男性用於強迫勞動；搶奪、綁架婦女、兒童；購買胎兒、嬰兒；買賣器官。販賣人口的人利用同族關係甚至親戚關係來欺騙和綁架婦女、兒童出售到妓院或嫁給年邁、不健康的男人（高明玄 Cao Minh Huyền、梅文孟 Mai Văn Mạnh, 2017；Lý Hành Sơn & Trần Thị Mai Lan, 2017：188-189）。

政治犯罪通常在越南—寮國邊境地區進出。1996年，一些居住在歐洲和美洲的苗族裔人提出成立苗族國家的主張，並在2001年提出建立苗族國家的綱領，領土涵蓋了寮國北部、越南西北部和中國雲南省部分地區以及緬甸東北部的地區。隨後，參與在越南建立苗族王國組織的人員進行了違法活動，2011年，在越南的奠邊府省的 Mường Nhé 縣發生了與越南政府的衝突。這些活動還涉及寮國的一些苗族人，對寮國和越南的國防治安管上造成了困擾（阮文明 Nguyễn Văn Minh，2018：149-173）。

8. 結論

越南北部山區少數民族與中國和寮國的同族和異族的跨國界族群關係，在歷史上已經存在了很長時間。這種關係在東南亞大陸和中國南部民族史的歷史民族學區域背景下，該地區地形大部分是山丘，邊界管理困難，人們透過邊境的小路徑來往移動十分普遍。這是形成地方組織的有利條件，這些組織建立於跨國界家庭關係、家族關係、朋友關係、族群關係的基礎上，使政治體制難以干預。這對於邊界的開放性起著重要作用，即使在戰爭時期或各國努力控制邊界地區的時期中也是如此難以干預；因此各國在邊界管理方面必須靈活應對。

隨著地方制度的存在，兩國邊界上的發展差距和每個國家內部居民的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也推動了跨越邊界的人類族群關係。導致越南北部山區的跨國界貿易、勞動移民、婚姻和犯罪的原因主要有兩點，第一是中國的許多改革開放政策的成功，以及邊境地區的發展優惠政策和中國龐大的市場；第二是寮國的勞動力資源和投資資源仍然有限。另外，由於發展差異，勞動移民和婚姻流動是單向的，即主要是越南人去中國工作和越南婦女嫁到中國。這裡的少數民族已經很快被捲入這股潮流中。他們獲得了許多合法和非法的利益，帶來邊界地區的活力和複雜性。然而，地方制度的跨越邊界的人類族群關係的活躍性受

到很大的挑戰，這些挑戰來自中國所建立的邊境圍牆以及各國對邊境管理越來越嚴謹的管理方式。這些多樣且複雜的情形還要經過長時間的深入研究後才能有更進一步且全面的結論。

參考文獻

- Anderson, J. (2007). *The Rebel Den of Nùng Trí Cao: Loyalty and Identity along the Sino-Vietnamese Frontier*,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eattle.
- Anderson, James A. (2013). “Creating a Border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in Susan Walcott and Corey White (eds.), *Corridor of Interconnections: Eurasia from the South China to the Caspian Sea*, Routledge Press, New York.
- Barabantseva, Elena. (2015). “From “Customary” to “Illegal”: Yao Ethnic Marriages on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 *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 E-Journal, No.15, pp.57-81.
- Bé Viét Đăng, Nguyễn Khắc Tụng, Nông Trung. (1971). *Người Dao ở Việt Nam*,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
- Cầm Trọng. (1978). *Người Thái ở Tây Bắc Việt Nam*,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
- Cao Minh Huyền, Mai Văn Mạnh. (2017). *Tình hình tội phạm mua bán người qua biên giới Việt Nam - Trung Quốc, Lào, Campuchia và một số giải pháp nâng cao hiệu quả phòng ngừa*, trên trang <https://congan.travinh.gov.vn/catv/ch26/268-Tinh-hinh-toi-pham-mua-ban-nguoi-qua-bien-gioi-Viet-Nam-Trung-Quoc-Lao-Campuchia-va-mot-so-giai-phap-nang-cao-hieu-qua-phong-ngua.mhtml>, truy cập ngày 26/3/2023.

Chu Thái Sơn. (1987). "Tăng cường yếu tố văn hóa quốc gia ở các vùng cao biên giới phía Bắc", trong Viện Dân tộc học, *Một số vấn đề kinh tế - xã hội các tỉnh miền núi phía Bắc*,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 tr. 285-298.

Đại Việt sử ký toàn thư. (2011). Tập I,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

Đặng Thị Hoa. (2016). *Hôn nhân xuyên biên giới với phát triển xã hội*,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

Đặng Thị Hoa. (2017). "Di cư hôn nhân xuyên biên giới ở vùng biên giới Việt Nam và Trung Quốc", trong Viện Dân tộc học, *Những vấn đề cơ bản, cấp bách về dân tộc, tộc người ở nước ta hiện nay: Lý luận và thực tiễn*, Kỷ yếu Hội nghị khoa học quốc gia năm 2016,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 tr. 739-752.

Đặng Thị Hoa. (2021). "Quan hệ tộc người xuyên biên giới và tác động tới quản lý xã hội vùng dân tộc thiểu số nước ta", trong Viện Dân tộc học, *Về quan hệ dân tộc ở Việt Nam hiện nay*, Kỷ yếu Hội nghị dân tộc học quốc gia năm 2020,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 tr. 479-501.

Đậu Tuấn Nam và cộng sự. (2017). *Nghiên cứu mối quan hệ tộc người ở vùng biên giới với Trung Quốc góp phần ổn định xã hội và đảm bảo quốc phòng an ninh khu vực biên giới Tây Bắc*, Nxb. Đại học Quốc gia Hà Nội, Hà Nội.

Đình Quang Hải. (Chủ biên, 2022). *Quan hệ biên giới trên đất liền giữa Trung Quốc với các quốc gia láng giềng*,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

- Endres, Kirsten W. (2015). “Constructing the Neighbourly ‘Other’: Trade Relations and Mutual Perceptions across the Vietnam - China Border”, *Journal of Social Issue in Southeast Asia*, Vol. 30, No. 3, pp. 710-741.
- Hà Thu Thủy, Hà Đình Thành. (2020). “Quan hệ tộc người vùng biên giới giữa Lào Cai (Việt Nam) và Vân Nam (Trung Quốc)”, trong Viện Dân tộc học, *Một số vấn đề về tộc người trong xây dựng cộng đồng quốc gia - dân tộc Việt Nam hiện nay*, Kỷ yếu Hội nghị khoa học quốc gia năm 2019,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 tr. 352-379.
- Hoàng Thị Lê Thảo, Lý Việt Trường. (2021). “Quan hệ dân tộc xuyên biên giới Việt - Trung ở tỉnh Lạng Sơn trong bối cảnh dịch Covid toàn cầu”, trong Viện Dân tộc học, *Về quan hệ dân tộc ở Việt Nam hiện nay*, Kỷ yếu Hội nghị dân tộc học quốc gia năm 2020,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 tr. 278-291.
- Huang, Pengli. (2020). “The Making of a Modern Self: Vietnamese Women Experiencing Transnational Mobility at the China Vietnam Border”, *Social Inclusion*, Vol. 8(2), pp. 77-85.
- Huyện ủy, Hội đồng nhân dân, Ủy ban nhân dân huyện Kỳ Sơn. (1995). *Đặc trưng văn hóa và truyền thống cách mạng các dân tộc ở Kỳ Sơn*, Nghệ An, Nxb. Chính trị quốc gia, Hà Nội.
- Lê Ngọc Huynh. (2022). “Sinh kế của người Giáy ở vùng biên giới tại xã Quang Kim, huyện Bát Xát, tỉnh Lào Cai dưới tác động của đại dịch Covid-19”, trong Viện Dân tộc học, *Phát triển sinh kế bền vững của các tộc người ở nước ta hiện nay*, Kỷ yếu Hội nghị dân tộc học quốc gia năm 2021,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 tr. 241-254.

- Lê Ngọc Huynh, Trương Văn Cường. (2021). “Thu hoạch mía và khát vọng đổi đời: Lao động trái phép ở biên giới Việt Nam - Trung Quốc”, trong Viện Dân tộc học, Về quan hệ dân tộc ở Việt Nam hiện nay, Kỷ yếu Hội nghị dân tộc học quốc gia năm 2020,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 tr. 604-613.
- Lê Trung Dũng. (2016). “Quan điểm truyền thống của Việt Nam về biên giới và lãnh thổ quốc gia”, *Tạp chí Nghiên cứu lịch sử*, Số 10, tr.32-41.
- Lee, Everret S. (1996). “A Theory of Migration”, *Demography*, Vol.3, No.1,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USA, pp. 47-57.
- Lý Hành Sơn. (2008). *Quan hệ dân tộc vùng biên giới Việt - Lào*, Báo cáo tổng hợp đề tài nghiên cứu cấp bộ, Thư viện Viện Dân tộc học, Hà nội.
- Lý Hành Sơn, Trần Thị Mai Lan. (Đồng chủ biên, 2017). *Quan hệ dân tộc xuyên quốc gia ở Việt Nam: Nghiên cứu tại vùng miền núi phía Bắc*,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
- Maochun, Liang and Chen Wen. (2014). “Transnational Undocumented Marriages in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 Areas of China”,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Vol.23, No.1, pp. 113-125.
- Ngọc Thời Giai. (2008). “Di cư của người Dao xuống biên giới Tây Nam Trung Quốc và một số nước Đông Nam Á trong thời kỳ Minh, Thanh”, *Tạp chí Dân tộc học*, Số 6, tr. 59-68.
- Nguyễn Chí Huyền. (Chủ biên, 2000). *Nguồn gốc lịch sử tộc người vùng biên giới phía Bắc Việt Nam*, Nxb. Văn hóa dân tộc, Hà Nội.

- Nguyễn Ngân. (2022). *Tội phạm ma túy tuyến biên giới Việt - Lào ngày càng mạnh động*, trên trang <https://vtv.vn/phap-luat/toi-pham-ma-tuy-tuyen-bien-gioi-viet-lao-ngay-cang-manh-dong-20220606124939337.htm>, truy cập ngày 25/3/2023.
- Nguyễn Ngọc Thanh, Ngọc Thi. (1996). “Sự hình thành ý thức sản xuất kinh doanh hàng hóa của người Hmông ở Kỳ Sơn - Nghệ An”, *Tạp chí Dân tộc học*, Số 2, tr. 61-70.
- Nguyễn Thị Minh Lý. (2018). “Hôn nhân liên biên giới của người Hmông ở tỉnh Lào Cai hiện nay và những vấn đề đặt ra”, trong Viện Dân tộc học, *Một số vấn đề dân tộc, tộc người ở vùng biên giới và liên xuyên biên giới nước ta hiện nay*, Kỷ yếu Hội nghị khoa học quốc gia năm 2017,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 tr. 788-798.
- Nguyễn Văn Chính. (2018). “Nghiên cứu vùng biên: Vấn đề, lý thuyết và phương pháp”, trong Viện Dân tộc học, *Một số vấn đề về dân tộc, tộc người ở vùng biên giới và liên xuyên biên giới nước ta hiện nay*,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 tr. 27-54.
- Nguyễn Văn Minh. (2018). “Về ‘Vương quốc Hmông’ và vấn đề ly khai, tự trị của người Hmông trong lịch sử và hiện tại”, trong Viện Dân tộc học, *Một số vấn đề về dân tộc, tộc người ở vùng biên giới và liên xuyên biên giới nước ta hiện nay*, Kỷ yếu Hội nghị khoa học quốc gia năm 2017, Hà Nội, tr. 149-173.
- Nhức nhối ma túy tổng hợp trên biên giới Việt - Trung*. (2016). trên trang <https://tiengchuong.chinhphu.vn/nhuc-nhoi-ma-tuy-tong-hop-tren-bien-gioi-viet-trung-11314288.htm>, truy cập ngày 26/3/2023.

Phạm Quang Hoan. (2011). *Nghiên cứu tộc người Hmông vùng biên giới Việt - Lào*, Báo cáo tổng hợp đề tài nghiên cứu cấp bộ, Thư viện Viện Dân tộc học, Hà Nội.

Phạm Thanh Hằng. (2021). “Sáng kiến ‘Vành đai và con đường’ của Trung Quốc và cơ hội, thách thức đối với Việt Nam”, trong *Tạp chí Lý luận chính trị*, Số 6, <http://lyluanchinhtri.vn/home/index.php/quoc-te/item/3698-sang-kien-%E2%80%9Cvanh-dai-va-con-duong%E2%80%9D-cua-trung-quoc-va-co-hoi-thach-thuc-doi-voi-viet-nam.html>, truy cập ngày 6/3/2023.

Phạm Thị Mùi. (2019). “Chính sách của Cộng hòa dân chủ nhân dân Lào về lao động nhập cư và cộng đồng người Việt Nam lao động tự do ở Vientiane”, trong Viện Dân tộc học, *Một số vấn đề về tộc người và chính sách dân tộc ở nước ta hiện nay*, Kỷ yếu Hội nghị dân tộc học quốc gia năm 2018,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 tr. 462-472.

Quá trình hình thành và giải quyết đường biên giới quốc gia Việt Nam - Lào. (2017). trên trang <https://tuyengiaohungyen.vn/bai-viet/qua-trinh-hinh-thanh-va-giai-quyet-duong-bien-gioi-quoc-gia-viet-nam-lao.aspx>, truy cập ngày 6/3/2023.

Rowedder, Simon. (2022). *Cross-Border Traders in Northern Laos: Mastering Smallness*,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Scott, Jame W. (2014). *Bordering, Border Politics and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in Europe*, Euborderscapes, Working Paper 7.

Tạ Thị Tâm. (2021). “Quan hệ tộc người trong buôn bán ở chợ vùng biên giới Việt - Trung”, trong Viện Dân tộc học, *Về quan hệ dân tộc ở Việt Nam hiện nay*, Kỷ yếu Hội nghị dân tộc học quốc gia năm 2020,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 tr. 383-396.

Tạ Thị Tâm, Lý Cẩm Tú. (2018). “Chính sách phát triển thương mại ở cửa khẩu Móng Cái, tỉnh Quảng Ninh”, trong Viện Dân tộc học, *Một số vấn đề về dân tộc, tộc người vùng biên giới và liên xuyên biên giới nước ta hiện nay*, Kỷ yếu Hội nghị khoa học quốc gia năm 2017, tr. 343-355.

Thúc đẩy phát triển thương mại biên giới Việt - Trung. (2022). trên trang <https://mongcai.gov.vn/vi-vn/tin/thuc-day-phat-trien-thuong-mai-bien-gioi-viet-trung-p50662-c5758-n222482> , truy cập ngày 7/3/2023.

Trần Minh Hằng, Nguyễn Công Thảo. (Đồng chủ biên, 2016). *Quan hệ tộc người xuyên quốc gia ở Việt Nam: Nghiên cứu tại vùng Tây Nguyên*,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

Trần Thị Mai Lan. (2011). *Một số vấn đề cơ bản về chính sách dân tộc vùng biên giới của hai nước Việt Nam - Trung Quốc*, Báo cáo tổng hợp đề tài nghiên cứu cấp bộ, Thư viện Viện Dân tộc học.

Trần Thị Mai Lan. (2022). “Biến đổi sinh kế của đồng bào dân tộc thiểu số ở vùng biên giới Việt - Trung hiện nay”, trong Viện Dân tộc học, *Phát triển sinh kế bền vững của các tộc người ở nước ta hiện nay*, Kỷ yếu Hội nghị dân tộc học quốc gia năm 2021,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 tr. 205-218.

Tunner, Sarah et al. (2015). *Frontier Livelihoods: Hmong in the Sino - Vietnamese Borderland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eattle and London.

Turner, Sarah. (2013). "Under the State's Gaze: Upland Trading-Scapes on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 *Singapore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 No. 34, pp. 9-24.

UNFPA. (2018). *Sino - Vietnamese Cross - Border Marriage in the Context of Sex Imbalance: View from China*, UNFPA Country Office in China, Beijing.

Vân Khánh. (2020). *Việt Nam và Lào cùng hợp tác phòng chống ma túy*, trên trang <http://vietlao.vietnam.vn/doan-ket-huu-nghi/viet-nam-va-lao-cung-hop-tac-phong-chong-buon-ban-ma-tuy>, truy cập ngày 25/3/2023.

Viện Dân tộc học. (1978). *Các dân tộc ít người ở Việt Nam (Các tỉnh phía Bắc)*,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

Viện Dân tộc học. (2018). *Một số vấn đề về dân tộc, tộc người ở vùng biên giới và liên, xuyên biên giới nước ta hiện nay*,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

Vũ Trường Giang. (2017). "Di cư xuyên biên giới của các tộc người thiểu số ở vùng Tây Bắc", *Tạp chí Khoa học xã hội Việt Nam*, Số 4 (113), tr.40-48.

Vũ Trường Giang. (Chủ biên, 2018). *Di cư xuyên biên giới của các tộc người thiểu số ở vùng Tây Bắc Việt Nam*, Nxb. Lý luận chính trị, Hà Nội.

- ương Duy Quang. (2005). *Văn hóa tâm linh của người Hmông ở Việt Nam: Truyền thống và hiện tại*,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
- ương Xuân Tình. (2011). *Một số vấn đề cơ bản về dân tộc dưới tác động của sự phát triển vùng biên giới Việt - Trung (Nghiên cứu về người Hà Nhì ở một làng của tỉnh Lào Cai và một làng thuộc châu Hồng Hà, tỉnh Vân Nam, Trung Quốc)*, Báo cáo tổng hợp đề tài nghiên cứu cấp bộ, Thư viện Viện Dân tộc học, Hà Nội.
- ương Xuân Tình. (2018). “Tổng quan và định hướng nghiên cứu về quan hệ tộc người xuyên quốc gia”, trong Viện Dân tộc học, *Một số vấn đề về dân tộc, tộc người ở vùng biên giới và liên xuyên biên giới nước ta hiện nay*,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 tr. 119-148.
- ương Xuân Tình. (2020). “Không gian thứ ba và mạng lưới xã hội vùng biên giới Việt Nam - Trung Quốc”, *Tạp chí Dân tộc học*, Số 5, tr. 24-39.
- ương Xuân Tình. (2022). *Tộc người với quốc gia - dân tộc trong phát triển ở Việt Nam hiện nay*,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
- ương Xuân Tình. (Chủ biên, 2014). *Văn hóa với phát triển ở vùng biên giới Việt Nam*,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
- ương Xuân Tình, Vũ Đình Mười. (Đồng chủ biên, 2016). *Quan hệ dân tộc xuyên quốc gia ở Việt Nam: Nghiên cứu tại vùng Nam Bộ*,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
- ương Xuân Tình, Vũ Đình Mười, Lê Minh Anh. (2015). “Làng người Tày trong bối cảnh công nghiệp hóa, hiện đại hóa và hội nhập”, *Tạp chí Dân tộc học*, Số 4 & 5, tr. 7-24.

- Wang, Qian. (2019). "A Study of Vietnamese Cross-Border Migration into Guangxi Province, China",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 336, Atlantis Press, pp.90-94.
- Womack, B. June. (1994). "Sino-Vietnamese Border Trade: The Edge of Normalization", *Asian Survey*, 34(6), pp. 495-512.
- Yan, Ning and Xu, Mingyu. (2018).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Yunnan Cross-Border Ethnic Cultures in the B&R Implementation", *Advances in Econom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Vol. 58, pp. 411-415.
- Yin, Qingfei. (2018). "The Mountain Is High, and the Emperor Is Far Away: States and Smuggling Networks at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 *Asian Perspectiv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Vol. 42, pp.551-573.
- Zhou, Bo and Zhong, Yumeng. (2022). "Instability in the Cross-Border Labor Market: A Study on the High Job Turnover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Rural Vietnam to Rural China", *Sustainability*, No. 14, pp. 1-15.